

梁启超《郑和传》的思想导向及启蒙作用研究

施存龙

(交通运输部 水运科学研究院, 中国 北京 100088)

摘要:文章对清末维新派骨干、史学家梁启超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进行了详细剖析,既肯定该书对宣传海权、宣传郑和下西洋和开展郑和研究有很大的启蒙作用,也批判了该书中的殖民主义思想和保皇观点,以达到辩证看待、全面认识的目的。

关键词:郑和;朱棣;梁启超;殖民主义;保皇思想

中图分类号:K248.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891(2017)02-0060-06

0 引言

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日本的中文报《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写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以下简称《郑和传》、“传文”)文章。这位作者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维新运动风云人物之一的梁启超。^[1]这篇传记,由于文采胜于1903年在《大陆报》上无名氏写的《支那航海家郑和传》,被后来研究郑和者视为近代郑和研究运动开宗篇,多受推崇。笔者正式投入郑和研究后,找出该文一读,感到其片面性很大,对其个别论点已在1993年笔者撰写的文章中有不指名批驳。前几年又见有文章说他站在时代先进思想前列,又说是采用了科学比较研究的方法等,笔者不以为然,乃下力研究,发现这篇文章存在许多严重问题,未见有人分析批判,觉得有清除其不良影响但又又要保护其积极因素的必要,乃不揣浅薄,试将研究结果分篇写出。本文着重分析该文中指导思想上的导向错误,但也同时肯定他的启蒙作用。

1 作传背景

1.1 时代背景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中日黄海海战,清军大败,次年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省给日本。时为广东举人的梁启超等人联合上书清廷都察院,反对订约,结果无效。同年,孙中山领导旨在推翻满清朝廷的广州武装起义失败。光绪二十三年,法国强迫清廷同意不把海南岛割让他国;德军强占山东胶州湾;俄军侵占旅顺湾、大连湾。光绪二十四年,法军强租广东广州湾,并迫使清廷宣布两广和云南不让与他国。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至日本办《清议报》。孙中山在日本与康、梁商谈合作,因政见分歧,合作未成。光绪二十五年,帝俄迫订旅顺、大连租界和辽东半岛租地;义和团起义。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俄军侵占黑龙江省和奉天(今辽宁)某些港口。光绪二十七年,逃亡在西安的清廷,无可奈何地宣称“维新”。

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严重局势,除仍有此起彼伏的群众运动外,中国知识界提出“救国救亡”。对于如何救国图强,却分成两大派别,一是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另一是改良,以梁先生为代表。

1.2 个人背景

梁先生在政治上有力图救民族危亡一面,又有极力抵制革命、反对孙中山革命的另一面。他是个举人,没有官职,但他并不甘心于“布衣”,力图挤进封建统治集团中去,想通过改良维新活动在皇帝新政中分享政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7月3日,光绪帝召见了。为此,梁先生感激得不得了,说这是清朝“数百

收稿日期:2017-03-10

作者简介:施存龙(1928—),男,浙江宁波人,原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全国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领导小组办公室顾问。

年所未见”的特殊政治待遇。授他六品官衔,让他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工作。然而,顽固派慈禧太后及其“后党”不许他们维新。当后党发动政变时,康、梁把希望寄托在英、日帝国主义国家驻华公使和心怀叵测的袁世凯身上,把他们当救星。政变时梁和谭嗣同等还聚会在英国人李提摩太住处商讨办法,决定分头去找英、美、日公使。梁启超去求助日本公使无果,便在日本人掩护下,化装逃出北京,带上谭嗣同的“绝命书”直奔日本避难。梁启超逃亡日本后,并没从戊戌变法血的教训中醒悟,依然“保皇”,顽固地走向根本走不通的死胡同。梁先生在日本主编《清议报》,宣传光绪帝的“圣德”。他在日本,居然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指使从湖南专程前来日本的唐才常,联络长江南北的会党,把本是反清的会党群众引上他们主张的起兵勤王(援救光绪帝)。结果,唐才常重蹈谭嗣同被袁世凯出卖的覆辙,通过日本人拉拢张之洞,而被张之洞出卖受害。但梁启超还是没有醒悟,在日本和美洲继续鼓吹保皇思想和组织保皇党派,反对孙中山民主革命。

1.3 作传背景

梁启超的《郑和传》是在潜逃至日本政治避难,开办《新民丛报》时发表的许多政论和历史人物传记中的一篇。在这篇传文中,虽然宣扬了郑和下西洋的业绩,有图强祖国之意,但应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要看他是为什么样的思想政治路线服务,看他借永乐帝及郑和下西洋的事迹为清末中国做什么。

梁启超发表《郑和传》不是孤立的,把他当年、上年、次年的政治活动和发表的其他文章联系起来看,就很清楚了。发表传文的上一年,即1904年正月,他从日本回国,前往香港参加保皇大会,有各地保皇分会代表参加。他是极力主张保皇的领袖人物,与革命派冲突加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发表《敬告同胞书》,号召划清保皇与革命的界限。该年,梁先生发表了十几篇文章,除个别论经济、哲学问题外,大谈的是《论政治能力》、《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以及俄国君主立宪问题4篇,其他相关的俄国问题3篇,其核心思想是不主张革命,倾慕改良的君主立宪。其实,对于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主张,早期改良主义者的郑观应《盛世危言》等早就提出,梁先生不过步其后尘而已。孙中山和梁启超都在日本活动过,同时感受到日本君主立宪制度,但孙中山不向中国推行君主立宪,而梁启超却极力推销之。两人都游过“新大陆”即美洲,孙中山是引进共和制度,而梁启超却反对共和,反对自由,认为对中国国民不适合实行自由,只能是受专制统治。他在1904年2月《新大陆游记》中写道:“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受自由。”^[2]发表传文的当年,即1905年,孙中山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随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并向梁启超君主立宪论宣战。该年,梁先生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发表主要论文14篇,除论日俄战争问题多篇外,就是代清廷派往欧洲五大臣考察宪政报告书——《世界将来大势论》。

2 宣扬君主万能与殖民思想

20世纪初,人们对专制皇帝世袭制的弊病以及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祸害,有着越来越清醒的认识。认识到帝王个人的意志在决定社会发展的走向,明君的出现具有偶然性,只有废除帝制才是出路。而梁启超却仍然幻想出明君,在明君一言九鼎的条件下去强国富民并为自己挣得一个官职地位。他身为历史学家,不去总结中国封建帝制祸国殃民的沉痛教训,却总结出一个歪理谬说:君主具有万能力,可以籍其改良政治,改良民生。他在《郑和传》中公开宣扬出明君。

梁启超是个不稳定的爱国主义者。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提出爱国主义、爱国者新概念,认为不应只限于在保卫祖国独立斗争做出较大贡献者。“凡法施于民(创造发明,有利民),以死勤事(民事)以劳定国(治国安民),能御大灾,能捍大患的人,依据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实际贡献,都可以称为爱国者。”^[3]按照范先生的观点衡量,我认为郑和是爱国者,而梁启超原来也是爱国者,他热切希望中国能如“红日初升,其道大光”,“胜于欧洲,雄于地球”。但他到后来反对孙中山革命,鼓吹保皇主义——保没落的清帝和篡国的袁世凯,因而写《郑和传》时的爱国主义也很成问题了。

求国家的富强有两种不同性质,一种是殖民主义的,把自己国家的富强建立在压迫和剥削殖民地国家基础上,也就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另一种相反,是靠自己国家的资源动员人民有效地劳动求富强,以平等互利在国际上互通有无,并在可能条件下扶植落后弱小国家。而传文中所透露出来的,梁启超所追求的中国富强,却是前者。

笔者之所以说他传文有糟粕,一是其保皇思想,二是违背和扭曲永乐帝朱棣与郑和基本有益思想,三是给反对中国的某些人诸如“郑和侵略论”、“中国威胁论”提供不应有的口实,四是按他导向走去,则中国之命运,即使“图强”有成,将会是一个新生的帝国主义列强,也会是霸权主义国家。如果不加揭发批判,国际社会会误解我们一再纪念郑和下西洋中将他推崇的意图,对分辨是非能力较差的青少年和部分有狭隘民族主义观点的成人,也会有副作用。

2.1 梁著《郑和传》宣传专制君主万能力,为贯彻其政治上保皇思想服务

梁在《郑和传》中,虽然没有直接宣传其保皇和实行君主立宪主张,但在论郑和宝船尺度时,借题发挥,宣扬“尊曰专制君主有万能力”,就是明显一例。

粗看该传是在宣扬郑和业绩,以一扫受欺时代的中国人自卑感,激发国民自豪感,但他把下西洋壮举成就归功于个别雄主和能将,归根结底是宣传他君主具有万能力的错误的保皇思想,为君主立宪主张制造舆论。他在提倡仿效东西方列强海上争霸,政府鼓励支持乃至主持向海外殖民,向国际扩张。

2.2 叹息中国没有第二个郑和,盼望清末能出第二个朱棣式皇帝

梁在《郑和传》中感慨万分说:“哥伦布以后,有无数之哥伦布,维嘉达哥马(即今译的达伽马)以后,有无数之维嘉达哥马。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此说存在两方面问题需要评说。

笔者认为“时势造英雄”,只要客观有此需要,给以一定锻炼机会和物质条件,就会“英雄辈出”,第二个、第三个无数个比郑和更好的“郑和”会涌现。就按当时实际情况而论,能担任郑和这样的航海组织领导人,不会只有郑和一个。人才是有的,关键在于缺乏郑和之后可供英雄有用武之地的时势,或能造英雄的时势。因为明朝不求改进,没有将浪费的远航变为有利国计民生的远航,没有将朝廷垄断禁海民间的远航变成民间贸易的远航,而是片面停航,自弃远洋航海。如果不把厚往薄来、不利国计民生情况,调整到等价往来,有利国计民生上来,即使朱棣、郑和继续活着,也是维持不了多久。人力物力用之不当,入不敷出,就不会给人民带来什么实惠,反而增加负担和痛苦。

梁先生尽管在叹息中国只有一个郑和,实际也是在叹息只有一个朱棣。他企盼中国延续清朝从而能出朱棣式皇帝,具有皇帝万能权威,派出无数个比郑和更有作为的人扬威海上,根本是幻想。

2.3 歪曲决策人永乐皇帝朱棣的本意

梁文尽管赞扬郑和下西洋的决策人朱棣是个绝世英明的“雄主”,但有意无意地却在歪曲朱棣的形象,把他描述成一个扩张主义者和玩世不恭的君主。

第一,梁称“成祖既定鞑靼……西辟乌斯藏,……南戡越南,……乃更进而树威于新国。”意思是说永乐帝朱棣平定了蒙元残余势力,开拓了西藏,南征了越南,进而立威于东西洋上的新交往国。传中还说朱派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博取“万国来同等虚荣,聊以自娱耳。”笔者认为,朱棣个人虚荣心是有的,扩大招徕各国朝贡,想当天下共主,但不能说他整个出发点就是纯粹求虚荣自娱。他不但为了巩固海陆疆,而且是国际和平共处主张者,愿承担世界和平秩序维护者。

朱棣之所以使稍后的西班牙、葡萄牙两个航海强国国王黯然失色,在于朱棣航海力量强大而不欺人,不侵他国一寸土地;拿了人家一点贡品,回报以加倍的精细加工品,而西、葡两君主在于强而欺人夺人,称所到之地为“发现”,树起一个十字架,就算作是他们的领土了,原住民竟成了他们当然的奴隶;所到之地,吮血吸髓,把黄金、资源源源不断运回母国。还通过教皇,划一条瓜分世界的经线。这些,梁在中西方航海对比中,竟然只字未提,能算是好的对比吗?

第二,臆测朱棣下西洋的目的地。梁文自以为较“旧史”家高明之处,在于不拘泥于重复寻找建文帝之说,而新发明另一说。他说:“吾征诸史文,于郑君首途之前,有深当注意者二事:一曰其目的在通欧西也。”根据是什么?没有。看来他是从“下西洋”三字望文悟出“此行本志……西征也”,进而推定是“通欧西也”,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按明成祖和郑和等人根本不知道有确切的欧洲存在,只有模糊的西方还有远国存在,不可能成为招谕开读的对象。如果把郑和下西洋的“首途”即按现今说法叫“首航”、“第一次下西洋”目的定为欧洲,则其结果岂不等于宣布郑和远航是失败吗?因为郑和率领的船队第一次下西洋远远仅仅到达古里国,即今印度半岛南部科泽科德港,连中亚的波斯湾、西亚的亚丁湾都未到,离非洲东岸还很远。即使后几次下西洋,也

不过是到非洲东部南端,根本谈不上到欧西。因此,梁把郑和首途目的地订在“欧西”是极不慎重的败论。

2.4 羡慕和称赞哥伦布等殖民主义性质的航海

这是流露在这篇传文中又一糟糕糟粕。传文一开头,就大颂葡国王子亨利推行老殖民主义,接着他站在欧洲中心论和老殖民主义立场上,片面夸称哥伦布是位“发现新大陆”的盖世英雄,夸称伽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传文中只字不提美、非、亚各大洲土著民从此遭到大灾难、大屠杀,进入被毁灭、被奴役的黑暗时代的另一面。只要读读西班牙派到美洲的传教士卡萨斯于1542年成书的《西印度毁灭述略》便知。它提供的触目惊心的情况:仅仅今名海地岛(西班牙征服者当时取名西班牙岛)的一个岛,原有土著人300多万,剩下200人!“40年间,由于西班牙人极其残酷的血腥统治,有1200万无辜的印第安人惨遭杀害。我个人认为是有1500万人丧生。”“古巴岛……目前几乎渺无一人。圣胡安岛和牙买岛是两个美丽的大岛,现在业已变成一片废墟。”^[4]还有西班牙人卡斯蒂略《征服新西班牙信史》一书叙述的,是西班牙殖民者当年如何征服今天称为墨西哥的地方,彻底毁灭印第安文明。^[5]西班牙殖民者的这些滔天暴行,我无意都要美洲殖民先驱者哥伦布负责。但他这个始作俑者开的路,做出的坏榜样,却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因为他“发现”当时,就带头奴役、剥夺、残害美洲土著人的。就连上世纪把哥伦布列入人类百位名人的现代美国人麦克·哈特也不得不在书中说:“哥伦布……,应该受到责备的是,他对待印第安人太残暴了。”^[6]

传文还说哥伦布航海结果是:“印度(施按:这个“印度”是当时欧洲人不了解中国和印度时期误解而形成的地理名词,不同于后来理解的位于南亚印度洋的印度,而是指包括中国而且以中国为主包括真印度等的地名)不得达而开新大陆,是过其希望者也。”笔者认为此言差矣。所谓“发现新大陆”并不是他所预定目的地,而是以他称之为“契丹”即中国为中心的所谓“印度”,也就是美洲并非哥伦布预定的希望目标。他是走错了路,瞎撞上的。他闯到后来命名为“美洲”的岛屿,却认定把古巴当中国,认为接近了他的目的地,派出使者带上外交文件去见元朝大汗即中国皇帝(因为他还不知道元代早已灭亡而是明朝了),见到的却是个仅50户人家的酋长,他大失所望,但至死未悟是到了“新大陆”。他所希望得到的殖民地总督官位,从殖民地得益分成,儿子的继承权,就成了泡影,临死前留下的书面怨言,正是他失落的明证。当然,这给西班牙殖民者挣得了大量的好处,侵得大片新土地,成为西属“新西班牙”,掠得大量黄金和其他资源供西班牙贵族们过奢侈的生活。所谓“发现新大陆”赞词是欧美既得利益的历史学家给的,并传给原本不明真相的中国人。1992年,笔者参加由中国若干学会共同举办的意大利支持的“纪念哥伦布首航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听印第安土著后裔学者发言批判哥伦布航海,并流露社会主义中国怎么还有人在赞赏哥伦布的遗憾,颇有同感。

2.5 梁先生的《郑和传》违背郑和执行的非殖民思想

无论郑和第一次到第六次下西洋所执行的永乐指导思想,还是第七次下西洋所执行的宣德帝指导思想,都是招谕各沿海国家来中国朝贡并给以厚待,充其量是形式上形成一个大国为中心的形势,绝不侵占、掠夺、奴役,一句话,实行非殖民主义政策。今天我们赞扬的和能够向全世界说得响亮的积极东西,正是这一点。可是梁启超不然。他固然深痛清朝当时积弱,被西方列强欺压,呐喊图强,但既不想推翻清朝,也不想从根本上铲除殖民主义。相反,他羡慕殖民主义,羡慕有哥伦布这样向海外扩张殖民地的急先锋,有亨利及其后继者那样能开拓海外殖民地的葡萄牙君主。他为老殖民主义寻找借口。传文把老殖民主义者动因,说成是:“要之其希望之性质,咸以母国人满,欲求新地以自殖。”本国人满为患,所以向外国殖民有理。这正是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制造的舆论之一。

应着重比较两者航行对所到国人民带去什么后果,是造福于人,传播先进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还是带去野蛮、掠夺、侵占等,也就是带给当地人以实惠还是灾难,是福还是祸,留下的是笑声还是哭声,是感激还是诅咒。当然,从纯航海技术观点出发,哥伦布、伽马的航海成就,不可也不应抹杀,这也是人类航海进步的一部分,使两个世界人们有规模地相遇(以前仅有零星的接触)。但他们残酷掠夺、奴役原居民罪行累累,不足为训,不但不应羡慕而应严厉谴责。欧洲老殖民主义者,继他们之后,无数的“哥伦布”和“伽马”继续走他们血腥的路,这与郑和和平航海相去甚远。

梁先生以郑和下西洋未能在殖民主义中有所建树而兴叹遗憾不已,这是违背永乐、宣德两帝意旨下的郑和非殖民主义思想的。更有甚者,把他著文当时,中国人在东南亚的侨民、华裔“自殖”民人数达到540-550

万人并掌握了经济命脉,归结到是郑和下西洋的结果。他所谓“推原动者,吾思郑和”,说成是郑和推动中国人殖民东南亚的。事实上,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东南亚早就存在许多华侨,如他第一次下西洋在旧港遇到的陈祖义、施进卿等广东移民集团。当然,我们并不会看不到郑和下西洋后会与以后移民有关。梁又把海运业的航海与武功组合在一起。梁虽然是个政治活动家,但政治概念混乱,把明代的中国人自发移民到东南亚去,妄称为“殖民”,把殖民之事推到郑和下西洋头上,给现代那些攻击郑和下西洋是“侵略”、“殖民主义”的国家和人留下口实。

羡慕和提倡殖民思想,这点梁先生也有一贯性。他总是把中国人无奈的自发移民与西方侵略性殖民混为一谈,并力图与之比较导向后者。最典型的是他为明清时期几个民间自发移民的梁道明等人作传,题为《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我们很难说梁不懂殖民与移民这两个名词的范畴,但总是要与哥伦布殖民作比,则是事实。如在该文中感叹对比说:“呜呼,以吾所述八君子者,以泰西史上人物校之,非摩西则哥伦布、立温斯敦也;否则亦克雷武维廉滨也。”我们也痛心明清政府不为移民在海外的华人受欺压说话和后来者欧洲人排华而不支援,但这与梁先生主张中国政府殖民主义,完全是二个不同范畴。《八大伟人传》列举“殖民”到三佛齐国,所谓先后当上“国王”的梁道明、张璉,“婆罗国王某”,“爪哇顺塔国王某”,“暹罗国王郑昭”,“戴燕国王吴之盛”,“昆甸国王罗大”,“英属海峡殖民地开辟者叶来”。该传除将移民称为“殖民”外,最要害是暴露他的殖民主义思想。梁在传文中竟主张:“自今以往,吾国若犹有能扩张其帝国主义以对外之一日,则彼两省人(施按:指广东、福建)其犹可用也。……二曰殖民事业与政府奖励之关系也。列强殖民莫不以政府之力,直接间接奖励之”。梁的羡慕殖民主义亟欲仿效的思想跃然纸上。又说“海以南百数十国……以地势论,以历史论,实天然我族之殖民地也”《郑和传》继续发殖民主义论调,说什么“亚洲东南一大部分,即所谓印度支那及南洋群岛者,实中国民族唯一之尾(闾)也,又将来我中国民族唯一之势力圈也”。所谓“尾闾”,本是水利学名词,意思本指江河入海总口,梁用此意思是说那些地方是中国人殖民出路,此论又给那些攻击郑和为“侵略者”的国家和人提供口实。

总之,从《八大伟人传》到《郑和传》所表达的,与朱棣、郑和的言论行动,完全背道而驰。如果历史是按他政治幻想运行,腐败的清朝变成拥有强大海上力量的强国,梁先生成了该封建王国首相,必将那个“中国”误导上殖民主义国家,那将是各国人民的不幸,也是中国人民自身的不幸,使世界上多一个殖民主义强国,多几笔不幸的历史。幸好,梁启超的有关政治谬论都成了历史垃圾堆,当作反面教材。

梁启超在腐朽落后的清王朝四面楚歌,面临覆灭危险的前夕,不肯投身革命,不但写了大量保皇文章,并组织党派活动反对孙中山革命,也借题发挥写起《郑和传》、《殖民八大伟人传》之类文章,希望在封建“明主”基础上振兴祖国,扬威海上,实际是要满清皇族继续坐紫禁城太和殿。他没有觉悟到,正是漫长的中国封建帝制,特别是清朝统治丧失海权,外侮一个才从海上而来,正是他们阻挠中国出比郑和更优秀的真正的伟大航海家。把希望再寄托在改良清王朝强中国,完全是痴人说梦。

3 梁先生《郑和传》的启蒙作用

近代研究郑和下西洋史事的,无可讳言,开始于外国汉学家。1874—1876 年有迈耶斯,1877—1896 年有格伦威尔德,1895—1896 年有菲利普斯等人。^[7]那时中国人自己却未见有人研究郑和。而大多西方人和介绍西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却在大肆宣传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伽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及环球航行等。在民族自尊性的刺激下,加上甲午海战后,中国海权的丧失殆尽,先觉的爱国人士已发出救国图强的呼声,促使 20 世纪伊始,个别中国人开始研究和宣传郑和下西洋史事。继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大陆报》上出现《支那航海家郑和传》之后两年,梁启超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尽管是为其保皇立宪主张服务,毕竟与他《开明专制论》等专门鼓吹保皇的政论不同。扒去其有害部分之后,还是有些可取的成分,如宣扬郑和下西洋业绩的本身,这对近代中国人认识郑和下西洋事业有很大启蒙作用。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一件事往往随着时间、空间、条件的转移,其后果和作用也会转化。传文虽然未得其本人所望达到的目的,却有他始料不及的后果。它保皇和步殖民扩张后尘等的消极因素,已被历史前进的车轮所碾碎,不会有人跟他充当迂腐的保皇派了,而可取部分却突显出来。

梁先生的《郑和传》宣传了海权的重要性,这对唤醒中国人海权意识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甚至对百年

后的今日中国仍然重要。若没有海权,那时只能眼看着鸦片等毒品自由走私,连海关权都没有。由于他对郑和航海事业的宣传,那段连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遗忘或不知道的光辉历史逐渐被关注起来。由于郑和下西洋的事业本身含有积极因素,是一个值得宣传的题材,加上梁先生采用感情性文笔,易产生宣传鼓动的感染力。从他使用“祖国大航海家”为标题,虽不够科学却能吸引人。文中又用最高级形容词赞颂郑和,如“有一海上之巨人郑和在”,“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寄托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比那些民族自卑感、民族虚无主义者高明得多,使人读后掩卷而深思:“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等。由于他在客观上发起了近现代郑和下西洋研究,该文成了新阶段研究的开始标志。它促进一些中外学者投入研究郑和下西洋的兴趣。如向达在20世纪20年代研究并发表了《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20世纪30年代冯承钧,除介绍外国汉学家,就有1874年迈耶斯的研究和其他外国人在19世纪的研究,翻译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对《瀛涯胜览》等四篇记载下西洋中籍的考证专著,他自己也作了《瀛涯胜览》的校注,并作序出版。其他如张星烺、郑鹤声、吴晗、童书业、金天翮、管劲丞、李长傅等也是20世纪30年代投入者。抗日战争中,在非沦陷区的大后方也还有零星文章出现。抗日胜利后,有较多新人涌现。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海峡两岸分别都有人恢复研究。改革开放后80年代,以纪念下西洋580周年为契机,由半官方掀起一个新高潮。进入21世纪,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研究新高潮约在2004年掀起,这些都体现了梁启超的《郑和传》带头启蒙作用。

4 结束语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要站在时代新的立场和角度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仅要讨论“下西洋”本身的是非功过,而且要发扬其有利振兴中华,维护世界和平的有益成分。郑和所奉行的强大而不欺人、和平共处、平等互利、除恶安良等精神,正是现在和今后世界人民需要的东西。

参考文献:

- [1]梁启超.饮冰室全集[M].上海:中华书局,1926.
- [2]梁启超.新大陆游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 [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4]卡萨斯.西印度毁灭述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5]德尔·卡斯蒂略.征服新西班牙信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6]麦克·哈特.人类百位名人排座次[M].李唯中,译.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
- [7]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M].冯承钧,译.上海:中华书局,2003.

Study on the Role of Ideological Guida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ZHENG He's Biography by LIANG Qi-chao

SHI Cun-long

(Waterborne Transport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 Ministry of Transport,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Great Navigator of the Motherland ZHENG He*, authored by LIANG Qi-chao who was the backbone of reformis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well as the historian, in which the significant enlightenment roles of the book in the propaganda of sea power, ZHENG He's Voyage to the West, and carrying out ZHENG He's research are confirmed. Meanwhile, the ideology of colonialism and perspective of royalism in the book are also criticized. It is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of holding dialectical view with a comprehensive recognition.

Key words: ZHENG He; ZHU Di; LIANG Qi-chao; Colonialism; Royalist thought